

吴泽猷校友访谈（1973级）

受访者 1978年至2006年间三次在中国驻法使馆任职，两度在外交部西欧司任职，历任副处长、处长、参赞。2007年至2013年先后任驻刚果（金）、黎巴嫩大使。

采访者 庄泽楠

您于1973年进入北外法语系学习。请问您当年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北外，选择了法语系呢？

这个说来话长，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想不到。实际上，北外根本不是我“选”的，我自己也不敢“选”北京的高校。

当时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祖籍是江苏，原来参加高考时的愿望就是在江苏上个大学，心里的目标是南大或者南工（今天的东南大学），而且我的志向是理工科。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没有想到能上北京的高校，也没有想到要学外语，虽然我中学时学过两年俄语。

后来是什么机会让我上了北外呢？考完试以后，北外的招生老师主动找到我面试，并说北外有优先招生权，问我愿不愿意上北外。对于我这样一个江苏的年轻人来讲，能到北京上学，当然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刻就表示愿意。我还记得当时来招生的是俄语系的周圣老师，所以我以为自己会被俄语系录取。但实际上，我在开学报到的时候才得知自己是分配在法语系，当时也很高兴。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

您现在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法语学习生活吗？比如说当时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和您的老师们？

那当然，印象太深了！我来到北外学习之前，在农村插队了5年。那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中国的农村还很落后。从在农村插队5年的年轻人，一跃成为北京高等院校的学生，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对北外这段生活的印象相当深刻。

尤其是北外的老师们，个个都非常敬业、和善、耐心。我插队5年，文化基础比较弱，而且像我这样只学过两年俄语、没有任何法语基础的学生，在当时很普遍。我们那届同学中，只有少数人曾经在中学学过一点法语，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零起点。考虑到这个情况，老师们就非常耐心地教我们。

那时候的物质条件和教学手段都不如今天。练听力用的是台式磁带录音机，不像今天用电脑、用大屏幕。不过台式磁带录音机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先进、很了

不起了。阅读材料也是有限的，不像现在，我们都能轻易接触到外媒。那个时候主要有《北京周报》《中国建设》这些国内的外宣刊物，以及法国的《红色人道报》。另外，当时学生也没有参加外语大赛这样的锻炼机会。国内高等教育当时才刚刚开始回到正轨，还没有跨院校的、甚至是面向全国高校的各类外语大赛活动。

在北外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老师们又很和善，我们的师生相处得非常融洽。我现在还对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印象深刻，像薛建成老师、董明慧老师、庄元泳老师、王炳东老师、周洵强老师……他们都早已退休了，你们可能都不认识了。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之年，中国从此大步走向世界。此时，您刚从北外毕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的一员，成为当年历史风云际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请问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初到法兰西时的感受？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在这方面感受非常深。我刚才说过：我之前先在农村插队5年，有机会到北京的高校上学，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然后，1976年外交部在北外招录了一批学生去法国学习两年，我又有幸被选中，一下子又被派到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学业。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国这样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这给我的冲击很强烈。我心里就暗暗地想：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体制，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仍然很落后？

的确，我们的基础很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积贫积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建设成果，然而，我们依然和发达国家相距甚远。195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要“超英赶美”，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了，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这是1976年我初到法国时最大的感受。我当时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追上人家？

说实话，我那时候真没想到，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这真是了不起！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差别，很多地方甚至超过了他们。而我们的农村，说实话，目前和发达国家的农村相比还有差距，但是我前年回到插队的村子里去看过，中国农村的面貌也已经焕然一新。插队时，我住的那个小破

房子就是一个茅草房，墙是石头垒的，但房顶是茅草盖的，下雨天漏雨。现在，这种房子已经没有了，农民住的都是后来建的两层三层的楼房。镇里新建的中学很漂亮，和城市里的中学一样。

我们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大，我们整体的现代化水平正迅速接近发达国家，城市里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他们了。现在就看乡村（现在关键在农村），我们目前的发展战略包括“扶贫”和“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插队过多年的，所以他很重视这两个发展战略的重点。

您刚刚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谈。那么从个人角度来看，您刚到国外工作是否也有一个比较艰难的适应期？

这是肯定的。当然，今天的同学们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和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现在大家能接触到大量外媒的素材，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所以1976年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听晚上8点的晚间新闻，基本上听不懂，好在很快就适应了。

学外语，关键在于语言环境。我是江苏人，而且在江苏搬过好几次家，江苏这个地方的方言，恨不得隔几十里地就不一样，差别很大。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学习一个地方的方言，一到这个语言环境里，就学得很快。

我刚才说初到法国时我连晚间新闻都听不懂，但是也就经过几个月，语感和词汇量就跟上来了。所以同学们放心，你们出国学习或工作，不要担心有什么特别大的挑战，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困难，但是过几个月就好多了。当然你自己要用心，我那时候坚持天天看晚间新闻。

您在这之后将近30年的驻法期间里有哪些深刻的体验？

太多了。你们可能也知道，法国是西方大国里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个很全面的表述。有些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就和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包括北欧一些国家，包括瑞士这样的国家，但是它们还不能被称为“西方大国”；还有英国，20世纪50年代就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到大使级。所以说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就是法国，这一点，我们每次谈到中法关系的时候都会强调。从戴高乐时期开始，法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其特点——强调民族独立。所以法国在1964年就承认新中国也不是偶然的。

我在驻法使馆工作，也感受到法国对中法关系的重视。我们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全面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开展合作。所以，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以后，中法双边外交非常活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高层互访。“高访”对双边关系各个方面的推动都非常大。因为中法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历任领导人都访问过法国，历任法国领导人都到访中国，有的还不止一次。在我参加工作以后，一方面曾在驻法使馆工作；另一方面，在外交部西欧司（现在叫欧洲司）工作时，主要承担的也是中法双边关系事务，所以我有幸参加过多次“高访”准备工作。一直到退休以后，我依然很关注双方高访，比方说习主席在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时候访问了法国，去年中法建交55周年时又第二次访问法国。在中法外交关系方面，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高访。

第二，务实合作。中法之间有不少务实合作的好项目。例如核能合作，我们在广东建的第一个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就是中法合作的成果。今天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在迅速地发展，同时中法在核能合作方面已经从双边合作扩展到第三方市场合作。现在中国可以和法国一道在第三方市场——英国——建核电站。中法要在英国建三个核电站，第一个已经启动，第二个和第三个在准备阶段，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还有航空领域的合作，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在天津的空客A320组装厂。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中法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好的合作。许多都是我在工作中亲身经历过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提一下：中法之间不是有很多“第一”吗？刚才提到法国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此外，法国也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西方大国，即双方每年都举行一次战略磋商，这也体现了双方关系的重要性。

详细说起来还有很多，说来话长，我就举这几个例子。

驻外使馆人员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主要是联络、沟通、促进交流吗？

外交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驻外使馆，当然要承担你刚才说的联络、沟通、交流，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外交部的工作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多的是政策性的。比方说，中法之间如果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者是双方高层互访需要准备材料，包括谈话口径、背景等，这些都需要外交部起草。所以平

时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笔头工作，工作量是很大的。相对而言，你刚才说到的技术性的工作其实还都只是外围的工作，更核心的工作是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的——搞调研、起草文字材料、提出政策建议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工作中慢慢积累经验，才能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2006年，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大使；2011年，您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黎巴嫩共和国大使馆大使。非洲和中东都是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的地区，这两次任职分别给您带来了什么挑战？您是如何面对的？

当时能有机会去非洲和中东工作，我是喜出望外。这点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喜出望外？很多人可能会说：“我愿意去发达国家工作”“像你啊老吴，三十年同法国打交道，长时间在驻法使馆工作，在国内又管中法关系事务，你很有运气……”

但是我不完全这么想。我觉得学外语，或者从事外交工作，最好能让自己的接触面更广，能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这才是好运气。所以我去非洲非常开心，而且我到了那儿以后确实感觉眼界大大拓宽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你一下就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接触的人和事都很新鲜，担负的任务、工作，其具体内容也完全不一样了，觉得视野一下开阔了很多。

比方说我刚才提到，当年同法国的经贸合作主要是招商引资，为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到了非洲则相反，人家希望我们到他们那儿去投资。我们要思考：那里有哪些优势？怎么才能吸引中国企业去投资？双方怎么才能深度地开展互利合作？……

中刚政治关系很好，但合作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双方观点接近、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经贸方面也应当有合作成果。我到刚果（金）后，关键是考虑怎么同刚果（金）这样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开展深度的经贸合作。我积极地推动双方企业间的交流，并保持与对方的高层沟通、与我们国内沟通。我经常与先行在那里探索的中国企业商讨中刚互利合作事宜，因为那时一些大型国企也开始走出国门，探索怎么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那几年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推动经贸互利合作。不谦虚地说，在刚果（金）这几年，还是有一点工作成果、有点成就感的，所以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

后来到黎巴嫩，完全又是另一个世界了。我同样很开心，因为这又能极大地开阔我的眼界。我这人就是喜欢看陌生的世界。我到黎巴嫩的时候，“阿拉伯之春”刚爆发，整个地区局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涉及我们中国如何看待这个地区的形势变化、怎么处理和这个地区不同政治力量的关系。

中黎之间的经贸合作没太大问题。为什么呢？黎巴嫩是一个商业国家，黎巴嫩商人很出色，全世界到处跑，对华贸易也不少，主要是从中国进口产品，不光面向黎巴嫩市场，而且面向整个阿拉伯地区，甚至面向全世界，他们很厉害。所以经贸方面倒不是我的工作重点。我当时的主要关切就是在当地政局激烈动荡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中黎关系，以及与黎内部形同水火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

黎巴嫩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对中国都很友好。我们和他们也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因为“阿拉伯之春”矛盾激化。从外交角度来讲，我们不会在各派之间选边站队，但又要避免人家产生疑虑，所以必须向各方讲清楚：我们反对域外势力在中东地区搅局，但我们不干涉本地区任何一国的内政，我们希望黎巴嫩人民和好、团结，希望黎巴嫩和平、发展。我那两年工作重点就是跟各方——官方、民间、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方的媒体——多做友好的解释、联络和沟通工作，让中黎关系不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最终我离任的时候，黎方给了我一个勋章，我还是感到很自豪的。和离开刚果（金）时一样，离开黎巴嫩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成就感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再回顾当年在北外的生活，您觉得除了语言技能以外，在北外的学习经历为您之后的外交生涯带来了什么帮助？

帮助太大了。我刚才说了，整个学校的氛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师生团结和睦，这在精神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驻外的時候容易想家、想国内，一想到北外，就会感到很亲切。

另外，我们当时学语言用的材料——《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红色人道报》本身涉及的面很宽，不仅仅是语言本身，也涉及时政，所以北外的学习经历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如果我们的学生将来想从事外交工作，那么在大学期间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第一，语言要过关，否则你在国外与人交流很别扭很困难，你自己很难受；

相反，如果语言流畅过关，你自己会觉得很舒服，人家听了也会觉得很舒服。我刚才提到了我自己的情况。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条件上）比我们那时候优越得多，我也注意到了现在的孩子们在学习上仍然是很努力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不要有小聪明，觉得“我自己很聪明”“我能考上北外就了不起了”，然后就放松学习。一定要认真刻苦学习。

但是只有语言还不够，还要扩充知识面。尤其是将来有志于从事外交工作的孩子，一定要有比较宽的知识面。这个知识面不仅是指国际关系、不仅是对国际上的大事有所了解，还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详尽的了解。不了解农村情况可能是现在这些孩子们的短板。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城市的孩子，看到城里到处都挺好，觉得我们和发达国家没什么区别，感觉不怎么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但我刚才说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很重视扶贫和乡村振兴，这些也是我们国情的一部分。国情还包括许多其他部分，特别是我们的领先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两弹一星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造出来，再比如我们的北斗刚刚组网成功。

要充分了解这些国情。以后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你心里就非常靠谱，跟别人聊起这些事，你就非常清楚。这对如何给自己的国家定位、如何处理好和对方的关系、如何理解外方对中国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一定要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包括国际关系和中国国情两个方面。

您经常受邀参加CGTN法语频道的访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涉及经济、国防、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请问您是如何完成自身知识的积累和扩充呢？您是如何能够在百忙之中实现知识储备的呢？

说实话，我退休以后就谈不上“百忙”了，退休以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大部分情况下早晨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个在工作期间是不可能的，工作时不仅不能睡到自然醒，晚上还得经常加班。

话说回来，知识储备其实很简单，但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说实话，我去央视做的这些访谈，只是延续了我原来在岗工作期间的一部分内容。为什么呢？驻外期间，你经常要跟人打交道，跟官方、民间、媒体都要打交道，打交道的话题涉及各个方面，对方都对中国很感兴趣。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国家的人一见到中国的外交官都很想知道：你们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怎么

发展得那么快？人家感兴趣，所以你要跟人介绍。

另外，重大国际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地区国家的关系，还涉及地区以外国家的干预，这些都要看到，所以平常就得关注这些事。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就会把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

我退休以后对这些事仍然感兴趣。出于原来的职业习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两个主要的网站：一个是我们单位的网站，我总是兴致勃勃，一定要看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对外活动、他们的表态，以及部委领导的主要活动。另外，也必看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内容很丰富，特别是把内外媒体最关切的问题做了回应。我们不用大海捞针般地到处去看各个网站，看一下外交部网站，就能了解到你最关心的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我必看的第二个网站是新华网，了解国内外大事，可择重点打开看主要内容，看看详情。此外，其他一些主流网站也要不时有针对性地浏览一下。通过这样的日积月累，知识面就会越来越广。

您目前在法语学院开设了一门法语新闻听译的课程。请问是什么契机使您决定重返北外、走上讲台呢？

外交部每年会在一些高校进行小语种学生的遴选，一般是选拔二年级有志于从事外交部工作，并且语言能力、各方面前景都比较好的孩子。当时我从国外离任回来退休，承蒙车琳老师和戴冬梅老师的信任，她们说学院这些有意参加遴选的孩子，需要强化一下，让他们有更强的实力参加遴选考试。我说这是个好主意啊，况且我本人天性喜欢小孩，看见年轻人就开心，所以立刻就欣然上岗了。

我觉得，学外语最关键的是听力，如果听不懂的话，哪怕你掌握了很多词汇，你也无法跟别人交流，所以我觉得新闻听译课可以对学生们有很大帮助。第一，可以练听力；第二，常规的外语教学可能不太接触这些新闻方面的词汇；第三，语言之外，重大新闻涉及的一些事件的背景也值得大家关注。所以我就每周开心地和孩子们一块做做听力游戏，聊聊天，这是我退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我也感谢法语学院对我的信任。

同学们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孩子，比我那时候厉害多了，一是语言能力强，二是知识面比我们那时候宽多了。我对这几届孩子的印象都非常好，所以我每学期

期末都会打比较高的分，因为我真心觉得这些孩子都非常优秀。

不过我刚才也强调了，出色没问题，但是要认真，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出色，进了北外就不用功了，目前我还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们都还是很用功的，我很赞赏这一点。再聪明的人，不用功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语言，就是靠大量实践才能做到熟练掌握。

您对如今法语学院的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法语学院做得非常好啦。除了传统的教学以外，法语学院还组织一些外语能力比赛，也邀请我旁听过一些比赛并做点评。孩子们主动参加比赛，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让我十分欣赏。除了学院内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之外，我还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去参加北外这个层面的比赛以及全国高校层面的外语大赛，比如模拟联合国。我认识的孩子里面就有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的，都很棒。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我那时候要是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肯定拿不到奖。

寄语

祝法语学院锦上添花，越办越红火，为国家培养更多新秀。